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一期 ——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405a)

【往事非烟】	宽宥和抹除	郝 斌
【追根溯源】	为什么卞仲耘之死成了悬案	胡 平
【难忘岁月】	“文革纪事”——生活就是斗争	冯敬兰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上)	老 田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六)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往事非烟】

宽宥和抹除

• 郝 斌 •

1966夏至1969年夏，时值周一良先生53—56岁，这几年的他，多半在“牛棚”里度过。文革中，北大历史系有过一个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1)，周先生在“牛棚”中的境遇，目睹见证者不少；时光荏苒，屈指一数，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当年三十岁出头，如今也近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说起来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一切都该在宽宥之列。可以宽宥，但不等于可以忘记。理性与不回避、不抹除，应该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应有的习性和训练；或缺其中之一，恐怕难以治史。如今周先生的百年冥诞将至，我把一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回忆出来，一作对先生的怀念，二让年轻的朋友当个故事听听，庶使这段历史不致完全成为灰烬。

## ◇ 显现本尊

1966年的4—5月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连结一起，成为一个“反党集团”，倒台了。这时节，斗争还只限于上层，广大工农并不知情，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校长陆平不满，已非一日。这时的她，以高度灵敏

的政治神经，觉察到上层的动向，又经康生背后指点（2），于5月25日，在校园给陆平贴出大字报。只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就知道它颇费了一番心思：《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陆平的名字，前有宋硕，后有彭珏云，把他镶嵌在中间，闪烁其词，意思是说，陆平与刚刚倒台的彭真该有什么瓜葛，因为宋、彭既是彭真手下的干部，又是陆平上级机构交往密切的人士（3）。

下属对上级有意见，公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有点异乎寻常，也不会被容许。仅一天功夫，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被其他大字报糊盖得严严实实，事情好像就此烟消云散，其实风暴刚刚到来。6天之后，6月1日晚，被复盖的大字报直窜云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全文播出，语调铿锵，而且反复重播，直至次日。陆平跌坐家中，默无一语（4）。《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的时候，另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千字短文，说到“陆平及其一伙”的时候，6次使用了“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类语词。陆平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市委也罕有地被明令“解散”。到此一刻，人们方才悟到事情原来不小。这时候的北大校园，像一口烧开的热锅，到处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铜钟，几十年来上课下课都会准时响起，由此之后，长歇长弃。

这时候，历史系的师生大部散在农村参加“四清”；一、二年级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在京郊昌平县太平庄搞“半工半读”试点。不论大家身在何处，大字报的全文都是听了又听。北大虽然瘫痪，后勤事务好像还有人做主，星散的师生都有校车接回北大。刚放下行李，就有人喊历史系的师生到第一体育馆集合。那是6月5日的晚上，说是开会，却没人主持。人们站在篮球场上围了个圈子，场上空冷了好一阵，气氛凝重。忽然有人高声喊话。

那是从太平庄回来的学生。当时他们疑窦满怀。因为三、四个月以前，太平庄的“半工半读”有过一个开学典礼，市委书记邓拓曾来出席讲话，接着，他的《燕山夜话》就被批判，说里面有反党“黑话”，报纸上揭出一条又一条。如今，聂元梓大字报上赫然在列的彭珏云，就在太平庄蹲点常驻。学生们认为太平庄也是一家“黑店”。

在体育馆，先有学生当面质问几位班主任，不得要领，接着有人指呼总支书记徐华民出来答话。徐有问即答，只是满脸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语调无奈而真诚。又有学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话。周先生好像刚从农村回来，换穿了一件干净、褪色的中山服。他走入人圈，站定之后，先用两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摆，又抬起胳膊提了提领子，面色肃穆，昂首而立。他的回答跟徐华民一模一样，但字字皆有音节。学生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质问，僵持了一阵，泱泱而散。后来三年，周先生被批被斗多次，算将起来，能够保持师长尊严的，这是唯一的一次。至于其他“牛鬼蛇神”如我等辈，人格扫地净尽，遑论尊严。那天北大第一体育馆里的周先生，我以为正是他的本尊。

#### ◇ 《乞活考》公案

随后，从海军和中央部委抽调合组的“工作组”来到历史系，师生人等俱被安顿室内，顶着6月的酷暑，整天学习社论。周先生随同大家一起学习。

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墙内墙外，贴满了大字报，多半是从报刊批判翦伯赞文章上抄下来的语句，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个红叉。忽然有长篇大字报贴出，占满了大门两侧的虎皮墙。大字报说周先生早年的一篇文章内藏玄机，“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大毒草”指的是《乞活考》，周先生的一篇考据文章。西晋末年，胡族自北南下，北方人民流亡江南的一批又一批。其中从山西出来、被称为“乞活”的一股流民集团，行至黄河流域，

停留屯聚下来。他们拥有武装，自成聚落，心向南方的司马氏政权，抗拒胡族。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存自保的状态，竟维持长达百年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活动。史书上有关“乞活”的资料，本来点滴片段，散存各处。人们但知“乞活”其名，不能窥其全貌。经过周先生穷搜苦检，居然连缀成篇，“乞活”的面貌被勾画出来。这样的文章，没有功力，绝作不出来；能识货、能欣赏的人，也只限于狭窄的同行小圈子而已，就是学中国史的，也只是翻翻罢了。不想，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丁则勤，竟是近现代史教研室的一位青年教师。大概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正值国民党大军仓皇南逃之际，大字报说，《乞活考》是要溃逃的国军，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这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又能是什么呢？！读者朋友，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只印几百份的《燕京学报》上，向来没有多少人看。国民党上层，当时惶惶不可终日，谁有这份闲心去看这种枯燥文字？！再说，真的看了，就能复制出一个现代版的“乞活”吗！您看，那个年代居然有如此奇特的思维，不仅如此，它还能找到市场、被人接受，与丁则勤一起署名的就有一年级的几名同学，不过他们用的是一个小组的名义。

周先生这个时候还没有被“揪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侧身革命群众之中，于是“我也用大字报形式作了答复”（5），表明绝对不是。其实，历史系里能作考据的本不在少，熟悉考据的就更多了。大家心知肚明，谁会相信“大毒草”的揭发属真？只是不好说他什么罢了！有了周先生自己的正面说明，在我们看来，这件事就该过去了。

可在此后，周先生说，只要是小会批斗，《乞活考》和周先生的另一首寄内诗，总是没完没了的题目。“关于《乞活考》的审问就不止一次”（6）。在我沦为“牛鬼蛇神”之后，曾见丁则勤和一个叫高海林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单独喊出周先生到一个房间，呆了很久，好像就是这种“审问”。1989年6月，周先生到美国探亲，闲暇下来写点回忆文章，他在《我的“我的前半生”》中，单立了“《乞活考》招来灾难”一个题目，其中写道：“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和一个红卫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说此文乃为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大毒草’，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斗。……穿凿附会、歪曲解释的细节还有不少，手边无书，不复省记。”（7）

又隔了9年，到了1998年，大概是4月份吧，北大百年校庆将至，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整30年了，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商请周先生作序。周先生一看其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人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8）时隔30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可见他受伤害之深。说起这个高海林，也真是的，何止是周先生，他对向达先生（9）、对杨人F先生（10）也是如此。“牛鬼蛇神”一众，我们人人对他印象深刻。

写过序言之后，周先生心情并不平静。隔了两个月，1998年6月，时年88岁、已经卧病不能握笔的他，烦人代劳，写了《还想说的话》，先把上面我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发在《读书》杂志当年的8月号上。而后，对高海林的态度，周先生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接着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11）

到这个时候，又平添出一段插曲。北大另一位教授吴小如，看了周先生的“喊话”，不表赞

同，也写了一篇文章：《有感于“一笑泯恩仇”》。吴先生说：“这样的事如果被我摊上，我尽管不与那个整人的红卫兵计较，但序言我是绝对不写的。应该坦率承认，我没有一良先生那样宽容大度。”（12）从行文来看，吴先生的这段文字，大概写在1998年的秋天（13）。三年之后，2001年8月，周先生出版他的《郊叟曝言》时，在《前言》里说：“我对红卫兵的喊话，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见《莎斋笔记》260条《有感于‘一笑泯恩仇’》。现征得吴先生同意，收录此文以供参考。”（14）

事情真是曲曲折折。我以时间为序，把《乞活考》一事的前前后后，一一罗列如上。写到这里，笔者心中早已产生几点疑问：

1.对高海林，周先生真的宽容了吗？

2.周先生对历史系64级前来索序者说：“请你们告诉他（指高海林——引者），我至今不能谅解。”这个话，周先生自己何尝不知道，就是近为高海林的同窗，未必真会转达无误。既然如此，周先生烦人代笔写《还想说的话》的时候，为什么“拿个棒槌当针认”，偏要以它充做由头，衍接下来，才做宽容的文章呢？

3.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乃是仁智各见，不属学术之争。既然谅解了，那就一切全了结了，何必又去收为“附录”，作这种拖泥带水的事？再说，吴先生的那篇文章也许还没发表呢！您看，周先生说 he 征得吴先生同意，引自《莎斋笔记》260条。可《莎斋笔记》的出版，乃在十年之后（15）。这就怪不得周先生所说的出处，没有页码，只有“260条”了。

以上几点存疑，放在心里一久，慢慢生出一些觉悟，又觉得这些觉悟尚可自圆其说，趁此共同怀念先生之际，写在这里，请了解先生品格、习性的家人、同事，给予评论和指正。

1.对高海林，周先生确有宽宥之心，因此才会高声喊话，无奈对方没有回应，顽石不肯点头。周先生以受害者之身、长者之尊，主动表示谅解，真是有容乃大。对方果有回应，只要登门道歉，先生能有二话吗？！再说，《乞活考》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高海林。他大二刚刚念完，《乞活考》一文恐怕读都未必读过，不过跟屁虫而已，后来跟得久了，改当了炮手。说到“深文周纳，罗织罪名”（16），以致连周先生自己探亲美国之际，都被弄得因“手边无书，不复省记”（17），这种本事，更不是高海林所能具备的。

2.周先生改变态度，确定谅解高海林之后，用什么方式转达这个新信息为好呢？依照常情，就是再把索序的学生找来，说明原委，前番的气话一笔勾销，刚好一举两得。而周先生呢？他采用的是阵前喊话法，高声喊给高海林听的。喊话也无不可，不过我以为有些话是喊给另一个人听。这就是周先生每次说起高海林名字之时，都要提到的“历史系的一位教师”（18）、“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教师”（19），一句话，始作俑者丁则勤。丁则勤装药，高海林放炮；丁是教师，高是学生；丁是成人，高“毕竟是个毛孩子”（20）。周先生稍一平静，就立即不同高做计较了。而丁则勤呢？打从周先生迁入朗润园之后，两家相毗为邻。同在一个小区之内，相距不过百米。低头不见抬头见，窄路相逢之时，您想想，那个场面真是何其尴尬乃尔！“喊话”当中有如下一段，我以为值得玩味：“文革灾难开始后，他（指陈寅恪）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报上公开发表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后来这位弟子在陈先生面前跪哭请求原谅，陈先生只是说：‘你走吧！’”举出这个事例之后，周先生明白表示，他自己绝不会像陈先生这样做。这段话是说给高海林听的吗？高与周先生没有这份交情，周先生的文字也不会这样凭白浪费。窄路相逢的尴尬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后照样天天有。周先生宅心仁厚，才苦想出这个法子，隔空喊给邻居，先给他打了保票，他若是肯来，必定“相逢一笑”，绝不会给他难堪。

周先生的喊话，高海林没听见，丁则勤也没听见。老人家等了足足三年，他的一份好心，二人全没放在眼里。您想想看，周先生心里是什么感受呢？真是吃个苍蝇也不过如此。

3.在这种情况下，有吴小如先生的文章拿来，收作附录，心中块垒多少也可消除几分。

话还得说回来，道歉也非易事。听说，高海林在一个大学教书，书教得认真，口碑不错。我在出差途中，偶遇一个年轻人，他刚好在这个学校，说起高老师，十分佩服。他的话证实了我的耳闻。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到底没有登门面对的足够勇气。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把人推上那个暴力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和被整者，推上一个共同和谐的平台。多少年了，我们看见过有谁来搭建这个平台吗？！本来还有的三、五个台阶，后来也好像无声无影地全拆除了。顽石点头，原来也有难处。

1989年，周先生曾与顾廷龙一起赴美出席《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的顾问委员会。顾是一位书法家。本世纪之初，周先生迁入新居，在客厅挂出来他请顾廷龙写的一副字，宋人方岳的联语。上联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下联是“可与语人无二三”。下联“可与语人无二三”后来在明清小说里又衍生为“可与入言无二三”，另成一种意思。周先生向顾先生索字，索的不论是原生、衍生，恐怕都是晚年心境的反映吧！周先生把《乞活考》当作“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三件公案”之一（21），心里始终有道说不出的伤痛。顾廷龙的小篆写得极好，这副联语陪伴周先生度过了他的晚年。

注：

1. 先后揪出三批，共34人，占全系教职人员总数的33%。
2. 见《百年潮》2001年9月，王效挺：《康生曹轶W与‘第一张大字报’》
3. 3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彭珮云是该部办公室主任兼北大党委副书记。
4. 《陆洁回忆陆平：父亲是知识分子》，见《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1日。
5. 《毕竟是书生》，第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同上，65页。
7. 同上，125页。
8. 周一良著：《郊叟曝言》，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
9. 见《向达学记》，244页。三联书店，2010年6月。
10. 见《万象》，2012年11月号。郝斌：《断崖夜斗杨人F》。
11. 同8，见92—93页。
12. 见吴小如：《莎斋笔记》，260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
13. 吴先生的文章开头说“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更口授一短文…”周先生的短文发在《读书》1998年8月号，由此推断。
14. 见《郊叟曝言》，第7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5. 见11。
16. 同5。
17. 同7。
18. 见《毕竟是书生》，125页。
19. 见《郊叟曝言》92页。
20. 同上，93页。
21. 同上，99页。

□ 原载：《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

~~~~~  
【追根溯源】

为什么卞仲耘之死成了悬案

• 胡 平 •

今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时期的师生和几位老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为1966年红八月期间部分学生打死打伤老师一事表示道歉。

在场的几位当年的老师和老师的后人纷纷发言，表示接受道歉并予以原谅。其中一位发言者是我北大读研期间（1978—1981）的同班同学丁冬红（又名胡依年）。她的母亲胡志涛也是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长，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伤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红告诉我的。在会上，丁冬红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半个月后，1月27日，原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在“八五事件”中被殴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珪先生发表声明。声明说：“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是的，没有真相，就谈不上原谅。胡志涛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谅；王晶珪不知道真相，他当然有权拒绝接受道歉。

那么，为什么直到48年后的今天，王晶珪先生——更不用说广大公众——还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凶手是谁呢？为什么那么多知情者都不肯公开说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释说，因为打人者当年都还没满18岁，属于未成年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要对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包括不得公开其姓名住所照片。

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上述原则都是针对办案机关的办案原则，但问题是，48年来，“八五事件”从不曾立案办理。

据说，在八十年代，针对受难者家属的起诉，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曾经以“罪行追诉时效已过”为由予以拒绝。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刑法确实有追诉时效的规定，追诉时效的长短取决于案情的轻重，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殴致死的，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分摊到每个打人者头上的罪责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诉时效不会很长。但问题是，像“八五事件”这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当提起公诉，无须受害者一方自诉。刑法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政府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政府的问题。48年来，中国政局历经沧桑，政府换了好几届，其方针政策以及法律经历过重大变化，但是每一届政府都没有对“八五事件”立案审理——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发生过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当时就得到处理；有些案件，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后来政局变化，又被当作刑事案件处理。由于政局的反复，有些案件甚至被翻来复去地处理过好几次。“四人帮”垮台后，当局宣称彻底否定文革，对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说，在这些审理和判决中，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一罪数罚，乃至冤假错案以及舍卒保车，舍车马保将帅的情况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细”的口号下，还有很多不那么起眼的罪行被放过去，如此等等，此处不赘。不过总的说来，文革期间各个阶段发生的具有其阶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体上还是得到了某种处理，好歹是走过形式。唯有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内的1966年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文革过来人通常称之为老红卫兵）的暴行，48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处理。

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始终没有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处理，那是不是因为在历届中国政府看来这些暴行都无可非议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众打死打伤，政府从不处理这些打人者，因为政府始终不承认土改是错误的。但红八月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复名誉了。

也不是红八月期间的暴行一律不加处理。例如从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针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大屠杀，事后政府也曾逮捕和判处了一批当地的公社干部和社员。据说在80年代，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给“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提出过一份“凶手名单”，说如果难属对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来的受害副校长当即拒绝接受此名单，因为“名单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红卫兵们，而那些贵为高干之后的凶手们连一个也不在名单上！”

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审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体。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犯罪者始终不被追究不受惩罚的原因。

不错，毛泽东发动文革，目标就是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派。毛整起高干子女来也并不客气。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联动”的老红卫兵。但是抓他们的理由不是他们对民众施暴，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3个月后，这批老红卫兵就获得释放。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20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处理老红卫兵在红八月打砸抢的暴行，也是因为他无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刘邓反动路线的帐下。毕竟，老红卫兵打人之风兴起时，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被毛批评，撤出校园。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带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没有制止，江青还上去拥抱彭小蒙，并发言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信中还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当天，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此前刘少奇发出的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当场接受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还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就在老红卫兵打砸抢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不错，毛泽东经常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归，毛始终没有对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进行处理。

等到“四人帮”垮台，文革被否定，当局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对文革期间的很多问题重新处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依法追究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老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文革后复出的党国领导人，没有几个人的子女当年不是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刘邓的子女）还一度是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后来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其中一种人就是打砸抢分子，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者。可是当局特地把当年这批涉嫌施暴甚至带有命债的老红卫兵们摘了出来，说他们不算“三种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说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对老红卫兵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由于历届中国政府都对这个群体格外袒护，致使其中良莠难分，好坏不明；若干重大历史真相也始终陷于混沌。48年过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

### 【难忘岁月】

#### “文革纪事”——生活就是斗争

• 冯敬兰 •

我在写作“文革纪事”过程中，需要不断地翻阅高二2班学姐罗治的文革笔记。她真是一个有心人，泛黄的横格纸上隽秀的字体已经发黑，却字字清晰，她就那样留住了一段历史。罗治笔记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譬如有关工作组和各种人物代表的系列讲话、当时轰动一时的社论、文章等。

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对自己进入师大女附中十天来的工作，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六月中旬，年轻的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广播讲话中说：“这几天运动怎么样？好得很！因为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新的阶段。广大师生员工对文化革命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并积极行动起来了，对修正主义黑线和代表人物进行大量揭发，大小字报已经贴出1000多张了。”“其中不乏一大批有材料、有分析、有份量的击中要害的大字报。斗争水平、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师生思想觉悟、阶级觉悟有了飞跃提高，几天的进步胜过几年，立场坚定了，斗争性增强了。”

张世栋认为，工作组取得了一些经验，为下一步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存在的问题都是方法性的，也是难免的，不足为怪的。他提出新的要求：（1）要坚持学习时间，认真阅读文件。（2）提高大字报的质量。抓准、抓要害、抓实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家路线；修正主义苗子；对待工农子弟、革命教师、干部子弟。（3）要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一道革命。（4）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八条规定，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新的革命秩序，这样更有利于斗争，提高战斗水平。

看上去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理性的，重点很明确。可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哪里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的话，好像专门冲着工作组说的，你求稳怕乱，而学生中不耐烦的情绪已是一触即发之势。



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位干部子弟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她们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这里我必须回顾一下，刘进、宋彬彬、马德秀6月2日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她们三人之所以对校领导有意见，是因为“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工作组岂不是在重蹈校领导的复辙吗？

由此可见，广大学生对文化革命的理解与校领导、工作组截然不同。一要稳定，二要有序，是一切担负领导责任的人（先有校领导后有工作组），必须想到的。而学生们则不然，大家渴望的是轰轰烈烈，是热血沸腾，是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才是革命。

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张世栋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的确，虽有1000多张大字报了，但都是泛泛的不满、重复的大道理，是执行上级错误路线的问题，怎么对校领导展开有针对性的全校大批斗？说白了，是没有子弹嘛！同时张世栋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特别是在高中学生中，迅速分成两派，当然，反对工作组一派，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弱势。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高三3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支持者为她大声叫好，反对者也毫不妥协。双方争先恐后爬上高台，慷慨陈词，直到半夜。梁二同是刘进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反工作组一派的领导者之一。

这是校园里继刘进等3人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后，仅隔两周的第二波全校大辩论。这次，刘进、宋彬彬等成为维护工作组的正统派，直到8月19日她们宣布退出女附中的文革运动，再也没有以激进的态度出现。

工作组的权威受到了强烈挑战，他们呼吁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辩论非但没有停止，第二天又演变成学生斗学生。有的班是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有的班则是趁乱整治出身不好、平时看不顺眼的同学。

很多年后，我听说高二2班整同学的事，其实，当时我们班教室和高二3班是对门，和高二2班斜对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当然，知道了我们也不懂。

1966年6月18日，高二2班率先在同学中明确划分三六九等，揪出12个“牛鬼蛇神”，分别扣以耸人听闻的大帽子。最近，我在孙行玲的新浪博客看到了这张大字报：

这两天，咱们班空前一致，没有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完全是假象。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A及其爪牙B；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C；一贯阴险、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D、E；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F；一贯欺骗组织、处心积虑的捞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G；一贯与组织对抗的小市侩H；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I；一贯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的阴险分子J、K、L等人纷纷出头露面，上蹿下跳，企图浑水摸鱼，钻进革命左派的队伍。警告你们，混水摸鱼是不行的，谁个真革命，谁个假革命，谁个反革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坚决横扫一切大的、小的、明的、暗的牛鬼蛇神!!!

毛主席的共青团员 1966.6.18

（因没征得当事人的同意，特将大字报中被点名的12人姓名分别用ABCD等12个英文字母

母代替。)

孙行玲的家离学校非常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天饭后返回学校，推开教室门（平时中午是不关门的），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一齐射向门口。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怪异。听到站在讲台边的同学说：“进来吧！”她才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不等她坐下，就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她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内容如上。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平常没发现有反革命言行。”她立刻遭到猛烈反击，有人说她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把她吓哭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出身决定立场。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出身资本家。过后班领导小组划定“左中右”，她是“中右”。

是谁策划发动了这场批斗同学的活动？当然是班里的“核心小组”。父亲的职位高低直接决定了她们的政治地位和道德优越感。只有她们才配当“毛主席的共青团员”，别人都是贱民，可以任意侮辱。看看这可怜的十二个人，有的从政治上当头一棒，有的从人格上给予诋毁，每一项“命名”都费了心思。譬如“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她们先给校领导定性“反革命黑帮”，然后再把“大红人”的帽子扣到A头上。A是高二2班班长，文革前校学生会文体部长，学习好、能力强、多才多艺、口才出众。是众多的嫉妒心拧成一股绳，让A成为12个“牛鬼蛇神”之首。她为了证明自己忠于毛主席，把毛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我知道还有一人，就是清华附中的66届高中生郑光召，即作家郑义，他早期的作品《远山》、《老井》曾名噪一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优秀作品。

我于2007年11月认识了A，当时她拖着晚期“慢阻肺”的羸弱病体，正参与发起、组织为卞仲耘校长塑像的捐款活动，因捐款意外遇到阻力，她把我叫到她家，希望我帮着在网上宣传一下。她极其消瘦，弱不禁风，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一停下就要吸氧。后来我去过她家多次，参与她召集的聚会。她的家一直是插队知青和校友团聚的沙龙。2011年5月，她坐着轮椅、带着氧气袋参加了在实验中学举行的“卞校长塑像揭幕仪式”，我还和她合影留念。当年12月的连续雾霾天里，她溘然去世。

在孙行玲博客看到的大字报，除了“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A及其爪牙B；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C；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F”等四人涉嫌政治外，其他8位同学受到的全是人格羞辱和诋毁，譬如一贯阴险、两面三刀，欺骗组织、处心积虑地捞政治资本，与组织对抗的小市侩，一肚子坏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仇恨革命干部及其子弟，笑里藏刀等等，这些涉及人品的攻击往往造成更深的伤害。

高二2班斗争同学的活动，充满戾气，开创了校园里学生整学生的先河。几十年后，依旧可以看到，在革命的汹涌波涛里，丑陋人性的沉渣怎样泛起。血统的优越感，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嫉妒心、报复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些人性的毒素，以革命的名义得到了发扬光大。

罗治的笔记里记载着：

6月20日全校开会，刘进作为学生会主席，讲了三点意见，主要内容如下：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随后做了补充讲话，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有很多人的意

见还没有讲出来。因此现在仍要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

怎样进行一般广泛、普遍的揭发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愿意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全校教职员工，学生只要你感到他有问题，就可以揭……

从工作组入校以来，还是注意发动群众的……但是有怕乱的思想，还不够放手，因此有急躁情绪。今后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动、支持、依靠大家革命，和大家一起闹革命。

希望一切革命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的热潮，打消一切顾虑，放下一切包袱……

罗治在记录这些讲话时，几处出现了删节号。也许是她走神了。两天前，她在班里被戴上“一贯仇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她只有18岁，就成了一个老牌反革命，这样严重的指控足以让人没有活路。可是现在有点不同，她不是孤立一人，还有另外11个同学与她一起忍受煎熬。高二2班有学生43人，30%的人成为“牛鬼蛇神”，再加上孙行玲那样明里暗里同情她们的同学，“毛主席的共青团员”们想孤立哪一个都不容易。

罗治被剥夺了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她唯一能做的，是继续做好“文革笔记”。

□ 原载《网易真话》

~~~~~  
【各抒己见】

对主流文革史写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上）

• 老 田 •

〔作者注：本文是2013年“统计与政治”讨论会上的发言，因篇幅较大，经过删节之后刊于2014年第2期《开放时代》〕

文革主要的政治现象是群众运动，而且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我读过三个版本的主流文革史，严家其的、金春明的、王年一的，这三本书读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分清到底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这三本书还特别突出文革中间的各种“恶”，特别是各种骇人听闻的受迫害情节、受迫害数字、经济损失数字。这三本文革史写法有两大特点：一是遮蔽掉文革中间的明确政治分野，二是强调各种“恶”，试图给读者建立起大数量的“恶”与一个含混的文革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文革史写法应该不算偶然，而是可以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前面谈到大跃进大量人口数字确定的困难，实际上确定文革的相关数字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还要大得多，大跃进时期还有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机构，文革期间不仅政府丧失权威和调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组成政府（或者革委会）的成员，不管是来自前造反派还是来自前当权派，都陷入了派性政治的泥坑。

我对武汉文革的研究主要通过口述史方式进行，以前试图反映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后来也只能舍弃保守派和当权派这两个方面，这两部分人很难接触，接触之后也很难让他们敞开心扉讲述自己亲历的历史。我的口述史研究，到最后得到的主要是来自造反派方面的资料，用这些口述史资料认识文革，应该算是一副带有造反派局限的“有色眼镜”。不过，从造反派的有色眼镜看文革，能够看到很多主流文革史写法中间忽略或者是“删去”的重要方面：文革理论和政策设计与文革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特别是当权派和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关键表现。这也还算是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把主流文革史遗漏的关键部分重新找回来，拼出了一幅更为完整的文革画图，在这样一幅画图中间，能够识别出大部分“受迫害”事件的“加害

人”。

## 一、文革的实践层次：群众运动与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历史的悲喜剧也许还是应该用当时的台词来描述，才会更准确一些，所以，我使用造反派同意的“镇压”“反抗”和“当权派”等词汇来表述武汉的文革政治博弈过程，同时，为了方便，也初步做出文革派、反文革派和非文革派的区分，这个初步的区分有助于说清楚文革期间不同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态度及分野。就武汉造反派的亲历而言，他们大多数人承认“十年文革”的提法。在这十年中间文革派力量和反文革派的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过程，我倾向于选用“政治博弈”的概念，但是，造反派非常强调自己的弱势，不同意我用“博弈”和“回合”的概念，认为力量对比极度不均衡条件下，这两个词汇都不准确。在造反派眼里，文革十年中间始终存在着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野蛮的镇压活动，整个文革十年是由反文革派的八轮“镇压”和造反派的六轮“反抗”构成的，自己才是文革中受迫害最为深重的群体，他们是全国人民中最凄惨的人，甚至在1976年之后这个镇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升级了。

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在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里面，有一个好处：可以看到非常强大的反文革派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是当时绝大多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势组合，而这个强势组合的巨大力量及其表现恰好是主流文革史所遗漏的。在“删去”了强势群体的表现之后，各种迫害行为就变成了没有“加害人”的受迫害叙事；同时也只有“删去”了强势群体表现之后，这样的文革史才能够支持那个著名的文革概念“一个人发动十几个人利用上亿人被愚弄”。经过底层文革派的有色眼镜，可以把在主流文革史里面遮蔽掉的、删除的力量及其表现，在口述史再现历史现场里面找回来。

武汉文革十年期间的“八轮镇压”和“六轮反抗”具体过程是：

第一轮镇压是“工作组镇压期”，1966年6—8月各地省市派出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发动群众运动，普通的学生参与政治，绝大多数是响应这种“面对面”的发动之后才参与的。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和武汉水院的党委一起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学生必须写大字报，说“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和不写是态度问题。”在学生贴出大字报之后，工作组和党委秘密召开学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左派会议”，让这些人去搜集学生的言论预备在运动后期“定右派”。与此同时，工厂中间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作队把朱鸿霞、刘传福、李向阳三个工人（该厂有一个13人的非专职的工人写作组，这三人都是写作者成员）打成“三家村”，后来朱成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刘则成为宣传部长。正是在工作组指导下在群众中间“抓坏人”的运动方法，在群众中间造成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明确分野和对立，前者是受到工作组和党委支持的“多数派”（后来公开建立组织成为保守派），后者及其同情者构成“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成为造反派），文革底层运动中间的两派，以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内容，都是当权派通过“面对面”的发动造就出来的。

根据当时不完整的统计资料，1966年6至7月，由省、市委工作队在21个单位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横扫牛鬼蛇神”，以“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反对和破坏文革罪”被枪毙的1人，死缓的1人，无期徒刑的1人，判15年徒刑的1人，被逼自杀的6人，自尽致残1人，受到纪律处分的112人，打成黑帮、右派、三家村批斗、游斗的1081人、被捕400余人（其中学生159人），共计1608人蒙冤受害。1966年8月24日省、市委指挥的武汉地区的官办红卫兵，掀起的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第二次“革命行动”中，先是改路名，对老字号商店门牌又砸又换，随后，凡是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右派”，都采取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剪裤子和剃阴阳头等“革命行动”，七天功夫，被抄家的21000多户，抄得

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万7千块，现金与存折440万，导致自杀112起，被恐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1）其实，这个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士，都还没有介入到文革运动中间来，从后来的演变看，被抄家被游斗的“黑五类”都是文革运动的围观人士，是标准的“非文革派”，而在运动初期挨整的学生和工人中间，只有一部分出身比较好的人士后来参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着手组织造反派，成为十年文革期间底层文革派的骨干分子，这一部分人算是“准文革派”——在自己明确参与文革之前就已经受到过政治打击，武汉许多造反派头头都有这个共同经历。

第一轮反抗是1966年8月—1967年1月底批评工作组和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起工作组或者党委领导运动，在群众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选定打击对象之后，指使党团员、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搜集“右派学生”的黑材料，这个搞法一开始，就有少数学生对这个运动的搞法不满意，采取公开批评或者越级上访告状的方式进行反对，这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导致工作组和党委更为严厉的打击。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2）武汉水院学生郭明正因为透露“左派会议”内容并明确不同意在学生中间抓右派，受到工作组和当权派的构陷，省委指示公安厅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逮捕他，打击郭明正的背景是王任重根据北京的“反干扰”精神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根据后来造反派汇集的资料，在决策“反干扰”“抓右派”精神中间，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陈毅、李雪峰、胡克实等政府高官都是一致的，康生、陈伯达到七月中旬才在内部会议中间表示坚决反对，直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七月下旬，文革小组成员才公开出面支持批判工作组的少数派。（3）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支持，显然，第一轮反抗就会迅速被镇压下去。

中央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就武汉地区而言，有两个举措的实际效果很大。一是周总理亲自指派人民大学的学生为领队、北师大为副领队、北航的大部队组成“南下造反大队”到武汉，这个造反大队到达武汉之后，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省市委，其中最激进的学生提出“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傅军胜本人在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接见时表示“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对这个意见当面的表示是欢迎和接受，（4）但是在背后，张体学说傅军胜这个大个子“坏透了”。湖北省委还部署“驱赶南下一小撮”，省委这个决策是通过本地多数派群众组织去执行的，方法是围堵南下学生进行辩论，有些辩论连续进行几十小时之久，不让吃饭和休息，引发南下学生9月2—4日在省委门口举行绝食进行抗议。二是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各地多数派学生面临着“犯政治错误的危险”逐步趋于消极，而造反派学生普遍建立公开的组织并逐步掌握运动的主动权。

到了1966年冬天的时候，在全国高校中间造反派普遍由夏天的少数变成了多数。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较高，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间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中间造反派的优势地位，这两大优势使得文革期间大学生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许多地区的工人组织或者农民组织中间也是大学生在发挥领导作用，西安的“东派”和“西派”对立中间，西派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力量很大，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东派编了个顺口溜说“农民总会没农民，里面坐着个‘西电临’；工矿企业是空架，里面坐着个‘西工大’。”（5）其他各地也是一样，南京的两派与南京大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相关，武汉最大的“工人总部”组织勤务组作出的决定，湖北大学学生陈春茂一个人有时就可以推翻。上海王洪文等人敢于成立“工总司”这样的造反派组织，与南下串联的学生特别是包炮有很大关系，武汉造反派的组织化过程的加快也与南下学生有很大关系。

在中央支持学生建立组织的背景之下，各地工人也开始串联并建立自己的组织，武汉的工

人总部是11月10日建立的，与上海王洪文等人发起“工总司”的时间一致。如果说高校学生建立造反派组织还属于政策容许和文革小组支持的话，工人超越政策容许范围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则完全是工人中间政治反抗能量积聚后的产物，张春桥在现场决定支持“工总司”冒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而毛泽东表示支持也是一种事后追认工人组织这种与内在于社会群体中间的政治反抗能量相匹配的产物。

在第一轮的镇压和反抗中间，贯穿文革十年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两派力量都出场了，运动初期挨整的少数派后来建立组织称为造反派，而运动初期紧跟工作组或者党委整人的多数派，后来先于造反派建立起全市性的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1966年9月12日），而造反派组织迟至10月26日才成立。而那些被抄家的黑五类，则是“非文革派”，无辜受害。为什么文革要按照“反右派”或者“打黑五类”的方法来搞，张体学在66年8月27日和3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是这样说的：“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帐，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对民主党派资本家冲击，这是不可怕的，把那些老寄生虫狠触动一下，狠吓他一家伙，以后，再来保护他过关。”〔6〕这代表了在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并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文革在中央层次已经明确要把批判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而且在各地的基层，从前受到批判、斗争的少数派，受到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以及周总理等人公开支持，少数派逐步向有组织的力量过渡，各地高级官员面临着上下两个方向的压力，张体学对于这两个方面压力采取了新的应付策略，省委所提出的策略主要是通过保守派组织实施的，有些来不及组织保守派的单位例如长航，是党委让保卫部门对“黑五类”和知识分子进行抄家和游街的。

第二轮镇压是1967年1月底—4月的“二月逆流镇压期”，1月底军队支左之后，首先抓捕军内造反派数百人，然后宣布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抓捕全市、企业两级造反派头头近500人。同时派出“军训团”压制学生造反派组织整风，试图压垮学生造反派组织并扶持保守派组织起来。

第二轮反抗是1967年3—7月“反逆流”时期的“反军乱军”，针对武汉军区支左后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及其后宣布的罪行，学生造反派组织很多调查组深入工厂调查，反驳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出来之后，学生造反派开始重新集结并游行示威；到五月中旬，一些中学生开始进行绝食斗争，武汉三中要求释放“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工人头头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局门口绝食，武汉一中的学生在“新公校”（公安局军管会支持该校保守派武斗打伤大批造反派）绝食，然后大学生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游行进行声援和支持。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喊出“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还有中学生贴出标语要“夺取陈再道的军权”。5月27日武汉首次出现“百万雄师”武斗杀死20中学生张昌森，晚上造反派组织在省委附近召开追悼会，悼词题目就是“陈再道杀人”，把武汉军区司令员看做是武斗的后台。军区支左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制止武斗办公室”，造反派给他们打电话，就直截了当地称他们是“武斗办公室”。

第三轮镇压是1967年夏天的“武斗镇压期”，1967年2月武汉市人武部系统成立以“武装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红武兵”组织，到5月16日正式又联合其他保守派组织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根据后来的审讯记录，百万雄师成立后“在东湖召集所有五十多个头头开了一整通宵的会，……原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第二步组织集体亮相，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第三步横扫‘牛鬼蛇神’。经过一夜的争争吵吵，最后他们决定把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与第一阶段同时并举，即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倒对方，横扫‘牛鬼蛇神’，交叉进行搞所谓集体亮相，进行夺权。他们的策略是先汉阳，后汉口，再武昌。在汉口先中山大道后解放大道，一条街一条街地对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进行打砸抢，什么三天扫平、一天扫平，计划很多。”市委还派了辛甫、林立等六个干部作为百万雄师的顾问小组。武汉军区“六四公告”

发出之后，肯定解散“工人总部”的大方向正确，六月八日，百万雄师地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此后，大规模的武斗陆续展开。（7）到六月中旬，造反派认为汉阳是“敌占区”，汉口是“游击区”（只剩下少数造反派据点），武昌是“解放区”，这个局势恰好与百万雄师成立时作出的“扫平计划”相吻合。到六月底的时候，汉阳各造反派力量比较大的单位，都已经被武力扫平，其中规模最大的武斗是6月24日攻打汉阳轧钢厂，是役造反派死5人，伤数百人，武大学生古立盛、张朝阳被杀；6月16—19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路段，连续数日发生“红武兵”武力攻打造反派宣传据点，死20余人，伤数百人；6月24日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死23人（一说死28人），女中学生朱庆芳被残忍虐杀；6月26日“长办联司”被赶出单位，至此汉口也已经没有造反派的安全据点了。大批被武力驱赶出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除了外逃北京上海之外，都躲进武昌的大学校园里面，水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上万人。在郑州当权派与保守派联手，明确提出要打垮造反派组织，希图在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时让中央找不到造反派，从而实现军队干部、当权派与保守派的三结合，这个意图之所以被发现很偶然，1984年代郑州在一个工程挖地基挖出前保守派头头杨某的日记，其中明确记载了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开会时的武斗计划和目标。（8）

从“百万雄师”5月16日正式成立到7月24日最后一次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总共存在了68天，据不完全统计，68天里百万雄师搞了70多场较大规模的武斗，杀死造反派近百人，杀伤数千人。（9）“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基本上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彻头彻尾的武斗队，其中真正参与攻打造反派据点的“红武兵”组织，成员人数大约在一两万人左右。在2009年百万雄师的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聚会中间，杨道远问他们对造反派具体有什么意见，打得那么凶，百头头答不出来，杨说那就不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你们完全体现别人的意志，有百头头表示同意说他们自己是“皮影戏”。（10）

第三轮反抗1967年夏天的“抗暴”时期，在造反派的单位和据点受到“红武兵”武力攻打时期，造反派相应地成立了“抗暴指挥部”，试图组织和调配力量进行有效的自卫。在这个时期的造反派内部，曾经对采取何种策略进行过辩论，最激进的主张是要“文攻武攻”，最消极的主张是“文攻武守”，中间派主张是“文攻武卫”（这个主张后来受到过江青的肯定）。总体上看，在进行“文攻”方面，造反派相对保守派和当权派有着巨大的优势，“百万雄师”公然杀人还到处进攻，这给武汉市民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怖，相应地造反派就得到很大的舆论同情。当时造反派主编的报纸《长江日报》市场价格是每份四分，《百万雄师》同样纸型报纸每份价格只有两分。6月26日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来电指责武汉军区，要求停止“百万雄师”对一些单位的围攻。

第四轮镇压是1968年“清队镇压期”，1968年2月，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相继成立，各个基层的厂矿企业或先或后都成立了革委会。省市两级革委会中间，造反派占据常委以上的成员名额40%左右，基层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比重更高。在1967年成立的革委会中间，造反派的比重就更重，甚至一些单位例如水院的革委会主任也由造反派学生充当。1968年夏天开始，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提出“捅马蜂窝”，把造反派从革委会内部赶出去。其实，要把造反派从革委会里边缘化，不需要这种激烈的手段就能够完成；就造反派的执政经验而言，参与革委会多数是名誉性质的，并不足以在革委会内部发挥实质性作用，朱鸿霞（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编了个顺口溜说自己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轿车来。”至于决定大事情不仅参与能力不足，而且参与机会也很少。随后，就是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派进学校，1968年首批派出的工宣队多数是造反派成员，目的是做学校两派的团结工作，消除派性，1969年以后重新派的工宣队从成员构成到目的都不一样了。

第四轮反抗是1969年春天的“反复旧运动”，在1968年夏天还处于派性争执的“钢派”和“新派”，在胡厚民（工人总部二号勤务员，结合之后是省革委会常委）推动之下，多次

上门向新派组织头头吴焱金等人做自我批评，对68年的“钢新之争”承认错误，最后钢新两派工人造反派头头联合起来搞“反复旧运动”。（11）作为反复旧动员令的著名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由钢派头头朱鸿霞、李想玉和新派头头吴焱金共同署名。造反派的主要感受是“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革委会会议很少开，大多数干部逐步恢复职务，此外，“百万雄师”等保守派组织趁机造舆论说他们从来没有错，他们支持的干部现在都出来了说明他们支持对了。造反派发起游行示威，最激进的部分还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市革委会。在九大之后，周总理亲自出面把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召集到北京，在京西宾馆集中了二十多天，批评造反派有意见和问题不是通过革委会内部协商解决，而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还试图“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随后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批评造反派居多，这个中央指示实际上部分地终止了“游行示威”的权利。

第五轮镇压1969年底—1972年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运动”，到了1969年之后，工宣队成员就完全变成保守派，目的就是开展“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基本上是1969年夏天之后，造反派在省市革委会内部已经不起作用了，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完全由军队干部和结合的地方干部决定。1969年11月，在北京集中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开班，把武汉市造反派头头和骨干1000多人集中到空军学院，说是要批判派性搞好团结，结果在陈伯达的主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与此同时，省市区和企业层层办“五不准学习班”（五不准一般是包括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络等内容），把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集中起来，由脱产的保守派成员做专职的“动力”进行“逼供信”，要求交代参加“五一六”的问题。这个运动的结果，几乎全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成员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造反派1972—1974年连续多次向中央上访，汇集的数字湖北省清出40多万“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张体学（结合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老干部）曾经告诉造反派说是总共是60多万。

据王力回忆说，中纪委官员告诉他全国共打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的结果看，这个运动是军队干部主持、老干部参加、以保守派为脱产“动力”搞“逼供信”，以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为清查对象，最后的结果是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这场运动不仅针对基层造反派，而且针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哪怕是文革期间履行职务行为只要是有利于造反派的都统统受到追究，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的大多数记者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受到迫害，（12）因为他们在文革前期采写运动情况并向中央反映各地真实情况，对于中央作出支持造反派的种种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也被当权派和保守派合伙构陷。

第五轮反抗1973—1974年的“反潮流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间，造反派在文革前期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反革命阴谋活动，受到无穷无尽的“逼供信”折磨，所以，这个时期最先提出的口号非常有针对性。1973年十大之后，首先提出口号“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批林批孔时期，武汉造反派有两个层次的博弈：一部分参加了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被称为“议会派”，这一群人参加省委在首义路招待所主持的座谈会，面对面地跟省市书记谈判，要求为整造反派而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另外一部分人坚持街头斗争被成为“反潮流派”，这派人除了在武汉街头组织宣传活动之后，还组织上百人的上访团到北京上访，曾经在京西宾馆门口组织静坐示威。经过造反派多次与省委协商，1974年“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被放出来，出来之后提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

第六轮镇压是1975年的“治理整顿时期”，据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回忆录《丹心照玉宇》中间披露，他和省委书记赵辛初一起去北京找中央领导，这位领导给他30个抓人指标，他们回来之后在2月7日广播了最后通牒，不等“反潮流派”有所反应，当天就出动警



察抓人，其中的武齐华死在监狱里，他弟弟始终认为是被活活打死的。后来根据“把闹事派一年调动三百五十六次”的高官讲话，参加省市两级革委会常委以上的造反派，都被流放农村劳动。

第六轮反抗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敦促省委“转弯子”。这个时期造反派成立“夏、谢、朱、李、吴、胡、顾”七人领导小组，提出“滚出去的要请回来”“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两清一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口号。胡厚民还两次去找从前的保守派头头喻文斌，想要说服他一起参加运动，团结起来对付当权派，结果这个“团结”愿望受到很多造反派头头的批评，说他是“投降派”（13）

第七轮镇压是1976年10月之后的“群众专政”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前的保守派“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和骨干，自发地地起来搞“群众专政”——先是抓造反派头头进行游街批斗，还有一些人百万雄师的头头在政府机构决策就抓捕一些造反派头头办“五不准学习班”，要他们交代与“四人帮”勾结的问题。这个过程不是很长，不久就传言邓小平说“文革两派都错了”，“百万雄师”很多人对此非常不服气。到1977年11月底，所有被“群众专政”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都被要求移交给公检法机构或者本单位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

第八轮镇压是1977年11月底开始较为正式的“揭批查运动”，这个运动上面由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领导，下面层层设立“揭批查”运动办公室。在纪检委主持的审查中间，仍然使用保守派成员当“专案组”成员，一个造反派曾经问过百万雄师的专案组成员，你们参加审查积极搞逼供信，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人老实回答说：我跟你以前根本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恩怨，领导告诉我，搞完审查之后帮我提一级工资。（14）纪检委审查的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审查的进度很慢，武汉有的单位一直拖到1992年才给审查对象作出“文革期间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其中武汉被判刑的造反派头头，是等到中央审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才参照其量刑标准宣判的，全国多数省区的审判也都是在中央审判完成之后才进行的。目前知道浙江是例外，先于中央的审判步骤，把张永生、翁森鹤从重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两次减刑之后，这两个人都是坐满了30年监狱于2005年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15）

因为经受太多的打击，造反派中间的骨干成员，到1976年也多数“非政治化”了。1976年春天武汉一中文革初期最积极的骨干，组织了一次游览东湖的活动，在三十多个成员中间，大多数对未来人生的规划都是要学好技术争取提高技术级别，追求更高的收入，早期的政治热情已经退潮了，大多数人完全生活化了，仅仅只有一个另类提到修正主义话题却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而且在造反派内部头头和普通群众之间曾经也有很深的隔阂，一些中学生甚至说下一次文革就是要揭发批判那些造反派头头，因为，在很多普通造反派挨整的时候头头们在表面上还是副主任、常委什么的，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很风光，这跟自己的落难处境形成对照，并由此推测这些副主任常委也没有为底层挨整的群众说话。等到文革结束造反派头头被判重刑，底层造反派也或多或少挨整，这个时期又等于重新确立了新的政治阵线：头头挨整更多被视为为了多数人的政治活动承担责任付出牺牲，旧有的认同又重新回归。而且，更重要的重新确立对于对立派的判断，有好几个工人造反派对我说过：现在老保掌权，在造反派的语境里面，老保实际就是为了自己向上爬不惜一切整人的人，除了对领导拍马屁职务没有别的原则，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别人踩下去，重新把对立派视为政治堕落的代名词并再次把这些人毛泽东和周总理作出区分；原先有很多造反派在自己挨整的时候，对于毛泽东和周总理都不无怨言，我们挨整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吗？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在重新认识了对立面之后，这种怨恨情绪也极大地下降了。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再政治化”过程：重新审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政治同盟。到目前为止，当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中间，已经自费用出版文革回忆

录将近 20 本，这个数字在全国省会城市中间应该也算是比较突出的，这些回忆录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治化的努力：除了为自己辩诬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帮助人们认识文革及其后的政治演化过程。

（未完待续）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六）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4 0 4 c，第八章 留校任教但文革仍在继续（1968.10—1980.10））

第六节 “狗熊”，其人其事点滴

“狗熊”是团派激进的“前哨”广播台负责人。在百日武斗中，他是大礼堂片区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团派中的中层铁杆。自从文革以来，他在清华已经小有名气。让“狗熊”恶名远播的，是因为他与团派保卫组和中技校的一伙人干了一桩令人发指的恶行：身体极棒的校航海队队员孙华栋是个没参加武斗的老四，他在晚上骑着自行车途经一教时“被团派人员绑架至第一教室楼内，遭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 80 % 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约 9 小时后死亡。”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狗熊”其真名叫吴慰庭。说来，他还是与我同系同届的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的。进校时，自 6 年级有七个班约 200 名学生。那时，像高等数学这样的大课都是在东主楼阶梯教室上的，所以应该是一起听过课的。我不是活跃分子，除了自己的班级，极少与外班的同学交往，所认识的外班同学寥寥无几。多年后，当有人说起吴慰庭是 6 字班的，我还不相信呢。一学年以后，几门课成绩挂红灯的留级，我班也有一位同学留级到了 7 字班，可能吴慰庭也是在那个时候留了级的。我们到大四的时候分专业，重新编班，一共有五个班级。我是自 604 班的。现在知道他是自 704 班的。我与他是不同届却是同专业的系友。即使是同专业的同学，因为相差了一个年级，互相间的接触也极少。所以，在文革前，我与他并不相识。

再见到吴慰庭，是我从宣化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回来，回到教研组以后。他从沙城解放军农场“劳动改造”回来。据说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去沙城农场，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宣化农场。前者是“改造”性质，后者是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虽然在思想上也有改造之意，但从政治上看，是锻炼性质。我和吴慰庭从不同的农场回校，因为是同一个专业的，于是我们在教研组里相聚了。在清查五一六之前，他是被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而我是群众一员，政治地位不同。在清查五一六之后，我自我感觉与他同样都是落难人，心情比他好不了太多。

想不起两派争斗时有没有与他正面接触过。教研组里相遇，我第一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他，感觉他真是一个身体健壮、体魄魁梧的人，具有运动员的体质。后来知道他确实是自控系的中长跑运动员。像他这样的形体，在影视中既可以扮演救危难于水火的侠义英雄，也可以扮演无恶不作的黑社会打手。可惜，他在文革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打手。只是在我见到他的那些日子里，他已没有了往日的张狂，言语极少，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他父亲是天津部队的高官，百日武斗期间曾跑到清华要拉他回去，叫他不要参加武斗。但是他坚决不听，誓言一心一意跟着伟大领袖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表现了他的“大忠”。打死孙华栋，他是主要打手之一，但非他一人所为。一般人到了要承担死罪责任的时候往往都尽力洗脱干系，不诬陷不抵赖已经是好样儿的了。他却大包大揽，把打死人的罪责全都自己一个人扛上了，表现了哥们兄弟的“大义”。一个如此“大忠大义”之人，因为“忠义”用错了地方，就变成大罪大恶之人了。

都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泛指显然是很错误的。但是对他，此话并非全谬。“狗熊”这一绰号于他是既形似又有点神似。说他头脑比较简单，可以举一个我亲历的事例。他在教研组里干的活基本上是拖地打扫之类等杂活。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要给大教室的水磨石地面打蜡。他找来蜡块，倒上酒精（或是汽油，记不得了），想把蜡化开了便于用拖把拖着打蜡。没想到一划火柴，火苗腾的一下就窜起来了。我正在上班，只听得走廊上纷乱的脚步声，还有人嚷嚷叫着失火了。大家赶紧去扑火。好在这是一间空旷的教室，里面的桌椅不多，火势很快就被扑灭了，算是有惊无险。吴慰庭脸色煞白，呆如木鸡。教研组领导把他叫去问话，他如实说了他的“好心”是想办点“好事”。后来教研组领导仔细研究了这件事，认为他想蓄意纵火搞破坏，好像还没这个胆量，也不合大白天在教室里干坏事的逻辑，所以没把这定性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也没认可他的“好心”。领导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说：“要是把主楼烧了，我们都得进班房去！”本来是水磨石地面，拖把拖拖就干净了，打什么蜡呀？打了蜡，走路非摔跤不可。就是化蜡，也不能用这样的易燃物，用明火烧的呀！是不是头脑简单了点？

说到这里，我从校友网上知道了他在百日武斗期间还做了这么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4 1 4 为了把科学馆里的一百多号老四救出来，最后一招是挖地道。从动农馆到科学馆，两头对挖。4 1 4 昼夜连轴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差一天就要挖通了。“狗熊”等在一教的这些老团活学活用电影《地道战》里的地下埋缸法，居然测出了地道的方位，用炸药把地道炸塌了。有的老团听到这个消息后，大骂“狗熊”是蠢蛋，说：“老四要逃走，就让他逃走不好吗？打了半天，不就是要把老四赶出清华吗？”后来有人调侃说是“狗熊”改写了清华武斗的结局。要是让科学馆的老四逃出去，沈如槐也跟着撤离学校，说不定工宣队不进校了呢。（我听到另有一种说法是，这事是在一教的保卫组那些老团干的，“狗熊”并不在炸地道的现场）

到 1 9 6 8 年，“狗熊”已是在校 8 年的大学生了。而他的年龄比我还要大 5 岁，打死孙华栋时，已经 3 1 岁。在清华，一般低年级的同学比高年级的同学要激进些。中学红卫兵比大学红卫兵要激进些。像“狗熊”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在大学里，特别是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即使不识字的乡民村姑，都晓得“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古训。守住做人的道德最底线，其实不需要太高的文化，也不需要太多的智慧，需要的只是一点良知。

“狗熊”头脑比较简单，个性比较偏执，爱认死理，一根筋，这可能与他的身世家庭和曲折的成长经历有关。文革之前，他也与不少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同学那样，沾上些不爱读书、优越感强的不良毛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坏学生。他十二岁给资本家当童工，上大学时曾是年级和系的生活委员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在辩论时曾勇敢地跳上台明确反对血统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文革，打开了他心底里那个潘多拉盒子，最终他成了一个恶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值得深思的！其实，根子早就种上了的。党化、奴化的教育培养的是惟领袖之命是从的奴才和打手。这奴才，自己成了奴才还要教化别人也成奴才。这打手，是把一切不愿成为奴才的和其他无辜的人摧残消灭的打手。只不过，这邪恶的种子在“狗熊”的心里开花结果，表现得更为突出、极端罢了。

“狗熊”，他在文革中是一个施暴者。某个意义上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被判了 1 5 年刑，碰到严打又多坐了 1 年牢。我听他的同班同学说，他晚年处境贫寒，日子难过。一想起

他那时惨无人道的施暴，大家都咬牙切齿，不愿搭理他。但想想他已经坐过牢，为他的罪恶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也有点可怜他。这些年里，自704班以及自7年级的同学，无论老团老四，出于对弱者贫者的同情，都在尽力救助他。从2007年至今，历时5年，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忙，最终补上了养老医疗保险。他是继老蒯之后又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解决了社会保险问题的校友。无论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大的罪与恶，现在作为一个公民，他理应有享受公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权利。

## 第七节 为了入党，我亏了心

清查五一六以后，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心情灰暗之极，感觉与处于监督劳动下的“狗熊”，也仅一步之遥。

同样都是刚刚参加工作，别人的档案都是干干净净的，我的档案里已经有毕业鉴定和清查五一六审查结论记录着两个政治污点了。我才三十岁，今后的路还很长。难道就这样在组织的冷待、别人的冷眼下度过我的漫漫余生？

我向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乐观的、跌倒了马上就能爬得起来的革命者，我不过是一个向往革命、愿意跟着党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只是，我越是想革命，反倒越来越不像革命者了。我整天低头干活，话也懒得说，见到人也懒得打招呼。

沉默寡言、愁眉苦脸的日子差不多有一年左右。时间是最好的销蚀剂，它会悄无声息地销蚀一切。好也好，歹也好，日子总得过下去。我不知道这算是想开了，还是麻木了。我比刚审查的时候情绪要好一点。但是，一旦静下心来，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记得，“九评”学习被“帮助”以后，也有过这样一段消沉的日子。

有一天，脑子突然之间好像开了一下窍。档案中的两个政治污点已经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了，但是，如果入了党，不就成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这污点冲淡了吗？想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改善自己政治状态的途径，看到了一线希望的亮光。于是，我找组织谈了我的思想，谈了要求入党的愿望。

组织当然也不希望看到我一直这样消沉的。他们觉得我本质上还是比较好的，只是犯了一些严重的但还可以改正的错误而已。他们首先肯定了我要求进步的态度，给我鼓励。然后告诉我仅仅口头申请是不行的，要书面形式的。还对我提了两点具体的意见，要求我以实际行动改正之：第一点是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与审查我有关的人，譬如曾经陪我住过的那位同学；第二点是要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要让自己首先在思想上入党。

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清查五一六以后我情绪一直很低落，除了在工作中必须要开口的，我对谁都没有交谈的兴趣。我不与人主动搭腔，别人与我说话我也是懒洋洋的爱理不理的。那位陪我一起住，对我起监管或保护作用的同届同学，因为与他没有工作上的交往，所以更是见面不打招呼，也没好看的脸色。说实话，我对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有很大抵触情绪的，但是对具体清查我的人，包括郝书记，我都没记恨。我知道这位同学人品不错，他也是受组织之命对我监管，在监护过程中他对我也没什么过分的言语和举动。这些我心里都是很明白的。要说有点变化，也只是感觉有点别扭。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也差不多的。可能在他的感觉里，就会敏感是不是我对他有很深的意见了。组织看在眼里，认为我这样的态度是还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本来我想把自己的想法给组织做个解释的，但一想，弄得不好反而成了自我狡辩，倒不如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个态度更好。

有天晚上，我约那个同学出来谈心，就我对他一直不理不睬的态度诚恳地向他做了自我批评。他也说了他并没有太介意我的态度。就这样，说开了，彼此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

这次主动谈心虚心检讨的谈话，我估计很快会传到组织的耳朵里去的。

除了这样的实际行动，我还写了“思想汇报”、“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错误态度的再检查”这样的书面材料给党支部。这些我过去很看不惯的为了入党而积极表现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也学着做了。在组织和领导面前，我表现得特别的老实驯服。

至于要我在今后的运动中好好表现，那是要等待机会的，由不得我。

嘿，不久机会就来了。

林彪倒台以后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是批林彪在生产、教育、科技、文艺等方面形左实右的错误。与林彪紧密勾结的江青当时极为被动。记得江青为林彪拍的那张学毛选的光头照刚在《人民画报》登载不久，林彪就自我爆炸了。而批林彪的形左实右最后就会批到江青的形左实右上去。于是江青坚持要批林彪的极右。毛泽东开始支持周恩来批形左实右，后来转而支持江青批极右。这样，在1973年年底开始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把批林整风演变成批林批孔，矛头直指周恩来。

清华的迟群是紧跟江青一伙的。他把持的清华在具体落实“反击右倾回潮”时，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矛头指向教师，把一些教师对工农兵大学生的态度、对教改的态度都上升到“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认为这些都是右倾回潮的表现。学校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有六十多人，点名批判的有四百多人。我记得有一个被全校重点批判的教师，他的“罪行”就是在课堂上对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扔了粉笔头。

我们教研组也不例外地开展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这一次，轮到史老师倒霉了。

史老师是老教师。其实也不老，那时才四十多一点。我们教研组里在文革前没有教授，只有两位讲师，他是其中之一。要是在电机、土建等老系里，与那些老教授相比，他应该是年轻教师。史老师很有个性，喜欢独立思考，说话比较随便，有些话与官方套话不是那么一致，生活上又有点不拘小节。这本来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更谈不上严重。最多，底下个别提醒一下就是了。但是在这上纲上线的年代，他的表现就很容易与右倾回潮挂上钩。他变成了从“矮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成了教研组在这次运动中批判的重点。我估计，在运动的大潮流下，与教研组党支部要是不找个典型批判一下就过不了关的想法也有点关系吧？

史老师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教师的帮助和关照一直是很热心的。我与他搞一个课题，对他的认真负责和业务能力都非常佩服。他的为人，教研组的这些老师比我更了解。与教研组里那些党员教师和年轻教师相比较，他的排位算是教师群体中差质一点的教师了。

要是我没有功利私心的话，在这样的运动中，虽然我不敢公开站出来为史老师辩护，起码我可以做到不说话、少说话、或者只说一些不痛不痒应付场面的话。

但是，我明明知道教研组批判史老师是不对的，有点过分，我为了在运动中好好表现自己，

为了能够入党，我在教研组的会议上也跟着领导的调子积极发言，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

一边内心有一种矛盾和斗争，觉得自己这样做很不地道。一边又想着，为了自己的前途，只有积极表现自己才能入党。

在那一刻，我已经迷糊到搞不清入党究竟是为了什么？

入党就是要为党的事业、党的利益而斗争、而献身。现在党号召要“反击右倾回潮”，具体的讲就是要批判史老师。我积极投身参加这场运动，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在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做很对，没什么可犹豫的。

但是，内心里又觉得把史老师当做批判的对象是不对的，不厚道的。

是听党的号召，还是听从真实的内心？在为了入党这一动机下，我最后选择的是听党的号召。

这一次，我的表现让党组织比较满意。他们认为我在他们提出的两点具体意见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我通过了组织对我的考验。

1974年10月6日，我终于入了党，成了一名新党员。

本来，入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喜事啊。从此以后我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我的政治生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档案中的两个污点将被入党志愿书所复盖，不再如噩梦般的纠缠我了。

我入党了，可是我一点欢喜的感觉都没有。

大学期间我也是积极要求入党的。如果那个时候入党，我想一定会激动万分的。那时候入党的动机要单纯多了，就是想着入党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以这样说，在我思想最纯真的时候，我想入党而没有能够入党。现在真的入了党了，但是思想上反而不那么纯真的了，入党的动机中已经明显夹杂着为自己个人前途的考虑。

不仅入党动机不纯，连入党的手段都不光彩。过去在战场上，火线入党，那是表现在爆破敌人的工事、堵枪眼、当敢死队，准备马上要“光荣”，要当烈士的。那种火线入党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样儿的！要是有一点私心，要是没有必死的决心和勇气，是绝对不敢也不可能火线入党的。而解放以后在历史政治运动中，凡是“火线入党”的，几乎都是靠着紧跟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批判打击别人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与战场上的火线入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我这次，也是这样的“火线入党”。

虽然我如愿入了党，我心里一直觉得有愧。深夜常扪心自问：我这个党员，真的像一个党员吗？

后来，文革被否定了，诸如“反击右倾回潮”这样的运动，也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我的内心更多了一份羞愧和内疚感。每当别人问起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都很不好意思说是1974年入党的。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1974年的大事件是“反击右倾回潮”。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史老师，心里愧得慌。

九十年代，有一次我回到母校，约了教研组的几位老师一起聚聚。我也请了史老师。尽管当着不少人的面非常难以说出口，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史老师道了一声歉。我说我那时的做法伤害了你，非常不应该，请原谅。史老师很宽容，很大度，说，过去的事情了，别老记得，没事。

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忘不了。这是一件亏了心的事，羞愧的事。每当我回忆往事，总是内疚自责，终生于心难安！

老话说，欠债总是要还的。欠的良心债也是要还的。钱财的债能还得清，良心债其实是还不清的。所以，最好一辈子都别欠一点点的良心债！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